

《全球商业经典》精彩奉献！
21 种挑战想象力的生活方式！

只有真正自由的心灵，
才能做到行走时旁若无人！

我有我认为 对的世界

致青春

王涌 编

倘若
坚固的墙和一个砸向这面墙的蛋之间做选择，
我会始终站在蛋的这边。

——村上春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我有我认为 对的世界

致青春

王涌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致青春：我有我认为对的世界 / 王涌编.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104-4633-7

I. ①致… II. ①王… III. ①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 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9451 号

致青春·我有我认为对的世界

策 划：北京阳光博客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作 者：王 涌 编

责任编辑：刘 媛

责任印制：李一鸣 刘社涛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 //www.nwp.cn

http: //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940mm 1/16

字 数：180 千字

印 张：14.25

版 次：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4633-7

定 价：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638

写在前面 改变中的未变

王涌

是否可以企望一系列丛书的视野和格局、想象力和创造力、独立性和人格的力量，有一个稍稍不同的面貌？

我们希望在信息碎片化的浅阅读时代坚守阅读的深度与锐度。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承认，人们在当下普遍焦虑，甚至焦虑得莫名其妙，能静一会儿几乎成了奢望。阅读已变得匆忙、浮躁，安定从容的阅读与思考过程被抽离了。

不是受众不读，而是可读的碎片太多，时间被碎片瓜分，结果流失而去的不是时间，而是我们自身。

但事实上，坚守深阅读的读者远比我们想象中多得多。我们也从困惑、反省中发现，作为传媒人的确曾一厢情愿地低估了受众，忽视了他们对深阅读的需求。症结就在于我们太过于关注表面的改变，忽略了深层的未变。

作家张炜用20年时间创作完成了长达450万字的《你在高原》，让其坚守的是他相信：用直射光阅读的电子屏幕永远不能取代用反射光阅读的书本。因为，人类的阅读，从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到刻在陶片、青铜器、竹简，再到印在纸上，其实都是通过反射光来阅读的，这让人安定从容、舒服和愉悦。这种愉悦是生命在漫长的进

化过程中形成的，不会被轻易改变。

基于人性的商业世界是复杂的，其包含理性、感性、欲望、想象……这是一个多声部的复调世界，却被“聪明”地简化为“成功学”这一个音符，且有一支巨大的单音伴奏队伍。我们不愿再做伴奏队伍中的一员，更不愿做伴奏队伍中的南郭先生。琴有多弦，为何只弹一弦？音有七符，为何只奏一符？

我们试着拨动其他的琴弦、奏响多样的音符。也许我们做得还不够好，但我们会在这条道路上埋头努力。欢迎读者的批评与鞭策。

序言

隐喻与预期

李国卿

一开始，我们打算讲一组“独立”的故事。

独立导演、独立设计——独立董事不算——独立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自由：有这么一些人，不因循通行的规范与节奏，因为自由，所以创新。

根据这些标准，我们找到一位在体制内当大学校长时就抵制扩招、在体制外又要办全国第一所民营大学的教授；一名10年前被9家二三线商场驱逐、10年后被上海一线商场力邀、中间开创和引领了长乐路潮流的设计师；一部开始时就被风传“正因为我們不是央视的人，所以才拍得这么好”的美食纪录片的总导演，而她自述的成功秘诀是“不让央视改片子”……当然，还少不了那个看似不计成本、拼上身家性命也要用“好莱坞式镜头”拍一部民族史诗的台湾导演。

在讲述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觉得，相对于他们的故事，仅仅“独立”两个字显得有点不温不火，还需要一些别的词来辅助阐释。因为与一般理解的那种游离于规则之外的“消极独立”不同，他们是主动挑战和打破规则的人。正如万达院线在其微博中推荐《赛德克·巴莱》时所说：“我们是服务行业，您选择什么样的电影，我们从不干涉。但是面对《赛德克·巴莱》，我们必须说，您值得一看。面对这如此血性

的电影，我们也愿意血性一次！”面对书中的故事，我也有一种要这样说说的冲动。

俗话说，鸡蛋碰不过石头。但我们要讲述的这些“独立”的“鸡蛋”，他们迎头砸上去的，可不是一般的石头——以双方体量的对比来说，简直就是一面石头墙。只是，这面墙的存在和表现方式因人而异：对于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来说，墙是教育部和高考体制；对于《舌尖上的中国》导演任长箴而言，墙是附庸流俗的恶趣味；说到魏德圣，他对抗的其实是“不可能”——一件30年都不曾有人做过甚至不曾想过的事，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至于残友集团董事长郑卫宁，他要砸的墙除了缺憾的人生，甚至还包括死亡。

2009年，村上春树在出席耶路撒冷奖颁奖礼时说：“倘若要我在一面高大、坚固的墙和一个砸向这面墙的蛋之间做选择，我会始终站在蛋的这边。”

小说家的表态直率，但也简单：选择蛋，只是因为蛋相对于墙是弱势。无论这堵墙是多么的正确，也无论这个蛋是多么的错误，他都会始终站在弱势的一边。

读完我们的故事，你却会发现，蛋不一定就弱势；蛋与墙的关系也不必非得是你死我活的对抗。不信你看：这世界上已经有一堆砸墙成功的蛋，而且还会越来越多。

我们可以顺着村上的隐喻继续推演：一枚普通的蛋砸向石头，俗话叫鸡飞蛋打；如果是一枚孕育着生命的蛋呢，撞墙说不定有助于它脱壳而出。蛋打鸡飞，这样反过来一说是不是有点绝地生机的意思呢？再说了，要是蛋们总这么没完没了地撞过去，保不齐哪天墙就成了弱势，村上那时候会选择和墙站在一边吗？

我们真正想说的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世界上正在真实发生的趋势。这一趋势也许在 2009 年的时候还不那么明显，但今天已经愈来愈清晰了。

法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对于好莱坞制作模式进行了调查并得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答案：所有以“独立”为名的电影其实都隶属于某个大的制片公司，没有哪部电影是真正“独立”的；或者说，所有电影都是独立电影。正如著名的昆汀·塔伦蒂诺，他既是一位独立的导演，但同时也是电影制片公司的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独立”在好莱坞属于美学范畴，却与电影的金融性质毫不相干。这是一种生产方式的变革：“制片公司”并不“制片”，而是相当于“银行”，对那些“独立”的项目进行筛选和投资。这种新的生产方式迥异于欧洲那种作坊式的，与体制死磕到底、老死不相往来的原教旨主义“独立电影”。好莱坞大亨塞缪尔·戈尔德温有一句名言经常被“美国墙”拿来教训“欧洲蛋”：“这个行当并不是艺术秀，我们称之为演艺业。”

还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于趋势的描述更为精当：第一、二次工业革命时代塑造了典型的集权式、垂直化的组织管理结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让分权式、扁平化的管理结构在各种组织中越来越普遍，个体也将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和力量。

“第三次工业革命”仍然处于不断地演进过程中，但这一趋势的迹象其实早就出现过。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唐德刚就曾举过一个距今已有半个世纪的例子，只不过他是为了论述别的问题。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为在太空工程上超赶苏联，要搞个嫦娥奔月的计划。为解决太空人登月的一切难题，‘太空总署’（NASA）与各大学和工商业研究机构先后订了 8 千多个‘副合同’（subcontract），

每个小合同解决一项难题。8千难题有一个不解决，太空人就上不了月球；而每一个难题之解决，事实上都是一篇或大或小的‘博士论文’。等到8千本博士论文全都通过，8千项难题通通解决，美国太空人阿姆斯特朗才能以‘小小的一步’踏上月球！”

想那8千个博士，起初也不一定了解NASA的“计划”，他们各自“独立”钻研，学位拿到之日竟是人类登月之时。一读到杰里米·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我就想起了唐德刚讲的这个故事。一直以来，“独立”故事对人们的吸引，多半与卓别林在其天才表演中对工业流水线泯灭个性的批判同一旨趣，但这与有“当代卓别林”之称的独立导演伍迪·艾伦的感受可能大不相同。而我们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讲“独立”的故事，也是因为在未来日益分权式、扁平化的管理结构中，唯有个性才能彰显价值。

上个月何力去了趟日本，他很好奇在东京物价这样贵的地方，小企业如何生存。然后他参观了一些小工厂——其实就是家庭住宅，所以没有租金负担。其中有一家，生产的东西称得上“微乎其微”——圆珠笔芯的滚珠——却仍然具有独到之处：工业流水线制造的钢珠太光滑，书写体验欠佳，于是他们在圆珠上刻上花纹，既能让笔出水更流畅，也不易损坏。日本制笔多属上品，原来背后还有一家家这样的小工厂。

圆珠笔芯的滚珠要算是最小的工业制成品了吧？比起它来，蛋已然是庞然大物。听人讲它上面的花纹，令我生出莫名的感动。

我们的理想不被左右

魏德圣：控固力的胜利

台湾人叫魏德圣“控固力”（混凝土），这就是说，此人是个不知变通的顽固分子。正因为此，魏德圣才能花12年，拍出台湾近30年来投资金额最大的一部史诗影片《赛德克·巴莱》 001

谭端

任长箴：绝不修改

“当年有人对姜文说，你这种长相不讨好观众，姜文回答说，我凭为什么要讨好观众？我要做的是征服观众。我也是这样，我从不讨好观众，我是要征服观众，做一个东西出来，就要把你征服得死死的。”

黄冰

老易：音乐是做给自己听的

老易本名易有伍，今年57岁，做唱片已将近30个年头。他成名很早，1986年创办雨果唱片不久，他便以制作高品质的民乐而闻名乐坛。之后的25年，在风雨飘摇的唱片业里，易有伍和他的雨果唱片一直坚守着一向不被人看好的民乐。时间长了，圈里人和他的粉丝便开始称他为“老易”。

曹可臻、廖晓玮

朱清时：坚持与妥协

朱清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去行政化”，自主建立一所像香港科技大学一样独立的研究性大学，重新找回失落已久的大学精神。出乎意料的是，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得他和南科大成为了挑战教育部和现有教育体制的符号。

秦蓁蓁

邱昊：独立设计师联合起来

“他这人就这样，十几年了都没变，说话太直，经常弄得别人挺不自在的。” 翹

001

019

030

040

翹解释说。邱昊向来有话直说，一个月之前，他还直截了当地批评业内设计师整体心态浮躁、抄版严重的情况，也不管这话别人愿不愿意听。

赵杏儿

056

我们就是要把爱好发挥到极致

字幕组的不传之秘

字幕组不是传媒时代的被动消费者，而是有能动性的生产者，在无生命的字幕里，因为他们的努力和坚持，打开了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大门，让被普遍平庸的电视节目压抑的年轻人接触到多姿多彩的海外多元文化。

叶雨晨

072

科学松鼠会

每次主持完活动，她总要拉着嘉宾一起去吃火锅，然后像机关枪一样“突、突、突”地吐出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人为什么长腿不长轮子？”“会不会有平行世界呢？”“外星人入侵了我该躲在哪儿？”

叶雨晨

082

三居室里的神奇工厂

3D 打印机还处于寻找市场切入点的阶段，人们还在摸索，这种神奇的机器到底能做什么实际的事情。

刘洲

092

新车间：创客的窝

社区出现在商业之前，新车间为创客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分享和共同创造的平台。

刘洲

101

我们的事业不一样

我们知道该如何跟这个世界匹配

刚刚大学毕业的 90 后张孟宁和马威开了家叫“Powerful”的情趣用品店，他们不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他们认为如果没成功只是因为他们不聪明，他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怎么去得到，他没有想过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该如何和这个世界匹配。

叶雨晨

116

我们能力不走寻常路

季逸超利用高考复习时间开发手机浏览器，西茜不上学拜父亲为师学画画，他们的成功说明，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90后，相比70后、80后有更多的资源打破坚硬的教育体制，他们愿为兴趣而努力的特征让他们能走出更多元的成功路。

叶雨晨

123

我们选择“勇敢迅速地试错”

练地摊的刘浩波、做公益网站的孟嘉文用自己的方式“在快速失败中快速积累经验，快速找到自己的位置”。很多90后在这种信条下勇敢迅速地做出各种尝试，他们似乎能够比前几代人更快地成长和发展。

叶雨晨

131

公益，需要我们的执拗

来读书会里停一停

英国财经记者、《管理百年》作者斯图尔特·克雷纳说：“在一个即时反应、行动导向、压力重重的商业世界里，书本改变了事务，改变了行为，变更了期待和志向。”在深圳这个高度商业化的城市里，读书会提供给书友一个内心的锚定，也在不经意间影响着他们对商业和生活的选择。

刘洲

139

一个被宣布“非法”的业委会

盟科观邸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没有想到：一开始，他们只是想炒掉开发商遗留下来的物业公司，三年过去了，他们不但没换掉物业，连委员会的合法身份都成了问题。

陈璐

146

拒绝赞助的救援队

这第一支国内正式注册的民间救援队，不愿意跟政府走得太近，也不接受任何商业援助，想要保持一种纯粹的志愿者身份。

秦蓁蓁

160

城市边缘的花木兰

作为一个打工妹自己组织起来帮助自己的民间组织，木兰公社到底能不能，或

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女工？创办人之一齐丽霞说：“我们解决不了她们的实际问题，能做的最多的就是陪伴，陪着她们度过这些灰暗的日子。”

刘洲

169

两个人的听证会

“听证专业户”胡丽天连续参加了成都政府的多个听证会，她把这称为自己的“人大代表的特质”。律师李宝平看重的是，听证会上的每个人有没有准确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诉求。

孙晓筠

177

我们为社会经营企业

黑暗中尝试对话

几经挫折走到穷途末路之后，红丹丹的郑晓洁开始从根本上反思公益组织没有造血能力的经营模式，她把社会企业当成出路。

左鹤

186

赚穷人的钱？

两个月前，佳信德润创始人易昕还不认为自己在做的是一家社会企业，他们想赚钱，而且是赚自己想赚的钱。

黄冰

192

毕业了，去办社会企业

毕业就创业的孩子大多是人们眼中的“怪咖”，毕业就创办社会企业的，更是怪咖中的怪咖。绿行家园能熬过这个最寒冷的冬天吗？

朱桂林

200

第五次创业

对于有过四次创业经历，满脑子草根商业智慧的牛健来说，创办社会企业，推广阳台花园，是他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第五次创业。

叶雨晨

208

魏德圣：控固力的胜利

台湾人叫魏德圣“控固力”（混凝土），这就是说，此人是个不知变通的顽固分子。正因为此，魏德圣才能花12年，拍出台湾近30年来投资金额最大的一部史诗影片《赛德克·巴莱》

谭端

魏德圣穿着雨鞋，肩膀上还是湿的，一个人坐在雨后的拍摄现场静静地吃盒饭。他看起来有些寂寞，演员们都不敢接近他。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的个子不高，站在1米80以上的几位原住民演员面前，勉强能够到人家的视平线。开拍《赛德克·巴莱》的2008年，魏德圣刚好40岁，然而他看起来至少要比实际年龄小10岁左右——这样的外表时常让人错估魏德圣的能耐和本事。

从小，魏德圣就比别人瘦小，长得很不起眼，课业成绩也不甚出色。但只要注视他的眼睛，人们立刻就会注意到魏德圣的眼神里微微透着一股倔强，他的身体里似乎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在郭明正眼中，魏德圣其实是个巨人，“别看他个子矮小，

却总能稳健地调度全场近百人；资金遇到困难，他也能咬着牙撑过去。”电影《赛德克·巴莱》的原著故事是魏德圣在1999年发现的，光找资金就花了9年，直到2008年开拍时，钱也没有找齐。他带着300来号人在又冷又湿的山上拍了快一年的电影，经常面临开不出工资的窘境。即便这样，整个拍摄也没有停下。

58岁的郭明正是赛德克族的知识分子，退休之前是高中老师。在《赛德克·巴莱》的摄制过程中，他的主要职责是语言和历史顾问。郭明正戴着耳机，盯着演员的嘴，确认他们都在用赛德克族的标准发音念台词。演员完成一段戏，他必须和导演四目相对，微微点头或摇头，向魏德圣传达台词是否过关，然后大家再等着导演决定是否喊“卡”。

“我有时看他一个人吃饭很可怜，就会主动去陪他聊天。”郭明正笑着说。

郭明正看着魏德圣指导族人演他们自己的故事：他的祖先为了寻求灵魂的自由，选择了玉石俱焚式的抗日；族内的祖奶奶们为了不让男人们有后顾之忧，全部上吊自杀。郭明正的赛德克族祖先们认为，战死之后灵魂到达彩虹桥的彼端，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在现场，郭明正一不小心就会滑入戏中，跌入80多年前族里那段悲壮的历史场景里去，因此他偶尔也会情绪失控。拍戏的时候，原住民演员们常常无法准时拿到工资，但每一个人还是尽心尽力地往下演。

这部片子，魏德圣从筹划到拍完一共用了12年，自筹了7亿元新台币，是台湾近30年电影史上投资金额最大的一部影片。

小魏，你的确会写剧本

2003年，你抓住一个人问，魏德圣是谁，大概没有几个台湾人知道；但如今，你到台湾任何城市的任何一条路上去问，不知道魏德圣的人肯定

很少。

魏德圣成了台湾那些被称为“热血”的电影导演的代表——他们中很多人都有倾家荡产和拿房子去银行抵押拍片的经验。从1999年台湾新闻局有正式统计以来，台湾电影的票房数字走势一直像病危患者的心电图一样，几乎“呈一条直线”。2001年，全台湾地区的票房收入仅为739万元新台币，折合人民币还不到200万元。台湾电影市场低迷持续了10年，凭着一腔“热血”和对电影的热爱，在这段时间里没有离场的台湾电影人都练就了敏锐捕捉观众喜好和制作符合市场需求的类型片的本事。

2008年，魏德圣拍摄的《海角七号》被公认为是台湾电影复苏的信号，之后的《艋舺》《杀手欧阳盆栽》《翻滚吧！阿信》等电影都是口碑票房双丰收。2011年，台湾电影总票房为86亿元新台币，台产片一共上映36部，本地票房达到15亿元新台币，占了整体票房的17.46%，与1994年本地电影市场占有率相比，增长了8倍之多。

在2008年爆红之前，魏德圣曾经长期失业。做了导演后，他的工作一直不稳定，经常是“接完一个案子不知下一个案子在哪里”。

在台湾导演杨德昌的电影作品中，永远有一个人物拿着武器准备行凶。此人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恐怖分子》中剪去男友下体的姐姐、《麻将》中射杀邱董的红鱼、《一一》片中刺杀英语老师的胖子、《独立时代》中自杀的李立中。

杨德昌是20世纪80年代台湾最杰出的导演之一，他之所以被称为大师，是因为他的电影极为精确地描绘了台湾都市生活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失常的人伦。他用自己独特的眼光还原了台湾经济起飞、被推崇为亚洲四小龙时期，工业文明兴起导致台湾人道德信仰崩溃的过程——城市中生存压力巨大，精神萎靡的人们无处可逃，总是处于想要杀人或是自杀的状态。

魏德圣当时就处于这种状态。

1995年，魏德圣27岁，他得到了一个机会跟着杨德昌拍片，做杨德昌的制片助理，杨德昌叫他“小魏”。这是个人微言轻、薪资微薄的职位，其实就是在片厂做做搬道具、清理水沟等杂务，有时还要兼任司机。这个工作说难不难，说易也不易：车要开得稳，水沟要清理干净，上班还不能迟到……总之是需要人苦干实干。这种活向来难不倒魏德圣，从中学到中专，他一直拿全勤奖，不迟到不早退，也不随便请假。

获得这个打杂的职位，对魏德圣来说实属不易。他1968年出生于台湾台南，1988年从一所没有名气的中专学校毕业。在台湾，从这种学校毕业的人通常是去工厂里当个小领导，家境富有一点的话，或许自己会开一家小作坊。但魏德圣却偏偏想去拍电影。他们一家和电影没有任何渊源，除了喜欢看电影以外，魏德圣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服兵役时经常和一位学电影的战友谈论电影，才萌生了电影梦。

因为没有和电影有关的学历，也不认识拍电影的人，20世纪90年代初，复员后的魏德圣只好从电视行业开始。他尝试去演员训练班上课，后来又在不知名的小型传播公司担任节目助理。1992年，他参加了一部台湾军旅片《想飞——傲空神鹰》的拍摄，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是赵文瑄，演员还包括后来大红大紫的任贤齐、吴倩莲等。当时这些演员在台湾都已小有名气，而魏德圣在这部片中的角色叫做“场记”——事实上，这部片的演职人员表根本没有登他的名字。

魏德圣白天打杂工、清水沟并负责开车运送器材，导演拍片时他就在一旁偷偷学艺。那时各大片场里的不少杂工，比如灯光助理等等，都是有电影梦的年轻人。工作之余，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每个人都想继承台湾电影的传统，都要用电影讲自己的故事。他们相互许诺，你拍我来帮你打灯，我拍你来帮我掌镜。魏德圣知道，拍片要有钱，而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